



斯坦因眼中的毛泽东

“一切都来自人民的信任”

□ 刘芮杉 夏正启

冈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1900年出生于德国柏林，1922年从柏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斯坦因先后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做特派记者。因为多次发表反对法西斯暴政的著作，他先后被德国和日本驱逐，最终来到中国。1944年，斯坦因作为美联社、《曼彻斯特卫报》等报的记者，参加了延安中外记者团，他在延安住了5个月，采访了数百名边区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先后与毛泽东长谈30多个小时。离开延安后，斯坦因发表了《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著作，向各国民众介绍了毛泽东，并称赞其为“今日世界上最伟大、最受爱戴的政治领袖之一”。

“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

在来到延安之前，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恶意诽谤，身处重庆的斯坦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缺乏清晰的认知。1944年6月，在第一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之后，斯坦因震惊地发现，与他见识过的灯红酒绿的重庆、戒备森严的西安不同，封锁线的背后洋溢着这样一群激情四射的革命者，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构建了一个如此热烈昂扬的新社会。

斯坦因第一次单独采访毛泽东，是在1944年6月的一个下午，延安城外的一处院落之中。院子由四孔窑洞和一片苍老的果树组成，小而高的窑洞经过了粗糙的粉刷，屋内陈设简单整洁。毛泽东穿着宽大的外衣，坐在一把旧椅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自制香烟。斯坦因则坐在一张老旧的矮沙发上，面前摆着一张摇摆不平的木桌，供他记录使用。

斯坦因的第一个问题，就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挥政府和军队？”毛泽东并没有因

为这样的问题而不悦，而是郑重地告诉他，一切都来自人民的信任，来自我们新民主主义政权领导下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八千六百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建了人民的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解放了国民党失去的领土。在这些领土上建立了民主选举产生的抗日民主政权，贯彻了共产党员仅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原则，在党的领导下蒸蒸日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从未放弃领导民选地方政府的权力，也从未放弃领导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军队的权力，而这一切的政治的、军事的权力，都来自人民的支持和认同。毛泽东用减租减息的例子，使斯坦因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着想，是“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的根本原因。在与毛泽东进行的30多个小时的谈话中，在长达5个月的观察与采访过程中，斯坦因真正地了解人们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敬爱。中国共产党的一百万党员，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的理论学说和他签署的各项政策，这是他在国民党内部所不曾见过的热情与团结。全党上下分管各项工作的20多名杰出领导人，都团结在毛泽东周围，以他为领袖和核心，完全是由于他的正确领导与先进理论。

“一个群众的小学生”

毛泽东虽然享有成千上万的党员群众的真心拥戴，但在与他的数次长谈中，斯坦因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毛泽东告诉他，“我也是一个小学生，一个群众的小学生”。

斯坦因回忆，群众路线的观点贯穿了与毛泽东谈话的全过程，这也是他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必须坚持的观点和方法。他向斯坦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只是中国人民的一小部分，只有这一小部

分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并为其利益而工作，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才是健康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反映工人和农民的意见，而且反映根据地内一切抗日人民的意见，包括支持抗日的知识分子、商人和地主。

斯坦因清晰地记得，毛泽东向他强调，假若党的干部是真心实意地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工作，那他们就有倾听人民群众的无数机会。毛泽东本人也亲身践行这一原则，他总是愿意推脱掉日常的琐碎事务，漫步在延安的街头，随心所欲地和各个领域党员干部、民主党派人士乃至最普通的农民谈心谈话。任何心有疑惑和有意向他求教的人，都有机会向他寻得帮助。

毛泽东反对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群众，认为人民群众是共产党员最好的老师。斯坦因借机发问：“你的政策从来没有被怀疑过或被反对过吗？”毛泽东诚恳地回答道，我们任何政策的正确性，都要由群众来考验和评判。我们的党组织不断地检讨我们的决定和政策，一旦发现错误，我们就立刻改正。而判断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就是人民群众的反应。毛泽东指出，全党上下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深化与群众的联系，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原则。

“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

在毛泽东的身上，斯坦因看到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气质。

毛泽东经常流露出质朴与纯粹。时年51岁的毛泽东，总是穿着宽大的外衣，与人打交道时神态松弛，言语和行动不疾不徐，让人感到亲切自然。在延安遍地黄土的大街上，他会在散步的途中随性地与老百姓交谈，而不带警卫；在和党内党外的各类人士拍照时，他不会

刻意站在中间；在发现斯坦因摆放笔记本的桌子摇摆不平时，他会亲自到院子里找块石头给他垫平那不齐的桌腿……

对于斯坦因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充满陌生的外来者，他会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每一个刁钻的问题。毛泽东与斯坦因的第一次会见，就从下午3点持续到次日凌晨3点。在长达12小时的会面中，面对斯坦因对于共产党政治生活细节的考问，包括许多从国民党那里听来的攻击，毛泽东始终积极热情、条分缕析地进行回应，直至斯坦因神志困顿、难以继续。可以说，平易近人，几乎是每个与毛泽东有过深度交流后的人的共识。

在斯坦因看来，毛泽东之所以直率而坦诚，是因为他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作为“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他的信念通过党的领导传递至边区的各个角落，使得边区的男女老少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与斯坦因在重庆看到的暮气沉沉、缺乏生气的景象截然不同，他在边区5个月的观察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在毛泽东柔和的神情与话语背后，斯坦因所感受到的是令人折服的思想。毛泽东有一副英明而又富有洞察力的头脑，他总是能够把复杂的战略和理论用极其简单而又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便是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其中的道理。斯坦因认为，毛泽东鼓舞人心的能力和举重若轻的特质，或许与他青年时担任教员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在延安，斯坦因随心所欲地去到边区的各个地方，采访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斯坦因认识到，毛泽东的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也是群众的意见，他做的事情正是老百姓想做能做的事情。在斯坦因的书中，他借一个受访者之口告诉全世界，倘若国共两党冲突起来，毛泽东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共产党将得到人民的信任。



东山战斗纪念碑位于福建省东山县西埔镇的东山战斗烈士陵园。1963年，东山县为纪念东山战斗胜利10周年而修建此碑。纪念碑由花岗岩砌成，整体造型呈塔状，高13.8米，基座边长4米。纪念碑正面镌刻着“东山战斗纪念碑”七个大字，背面是原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手书“人民战士英灵镇海疆”。碑座四周镶嵌的水磨青石上刻有立碑时福建军区各部队和福建省党政领导的题词，赞颂烈士们英勇抗敌的伟大功绩。碑座正面是东山县县委县政府撰写的《东山战斗烈士纪念碑》碑文，全文如下：

英雄的东山战斗烈士们，为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建立奇功，用鲜血写下了光辉史册。

一九五三年，正当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企图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破坏我国建设事业，唆使盘踞台湾、金门的蒋介石残余匪帮，派遣海陆空军一万余人，于七月十六日拂晓窜犯我东山岛。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在省、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直接指挥下，驻守本岛人民解放军和全县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杀敌；友邻省县军民，日夜兼程，积极支援。鏖战两昼一夜，歼敌三千余名，残敌仓惶溃逃，使美蒋窜扰破坏阴谋遭到彻底粉碎。

烈士们在战斗中英勇歼敌，为国捐躯美名永传。兹值东山战斗十周年，为纪念烈士们丰功伟绩，特建烈士纪念碑。烈士们永垂不朽，万古流芳！

中共东山县委会
东山县人民委员会
公元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六日 谨立

碑文叙述了东山战斗发生的历史背景、战斗经过以及辉煌战绩，颂扬了战斗中人民解放军团结协作、英勇歼敌、不畏牺牲的丰功伟绩和革命精神。敬读碑文，抚今追昔，我辈当铭记历史，奋勇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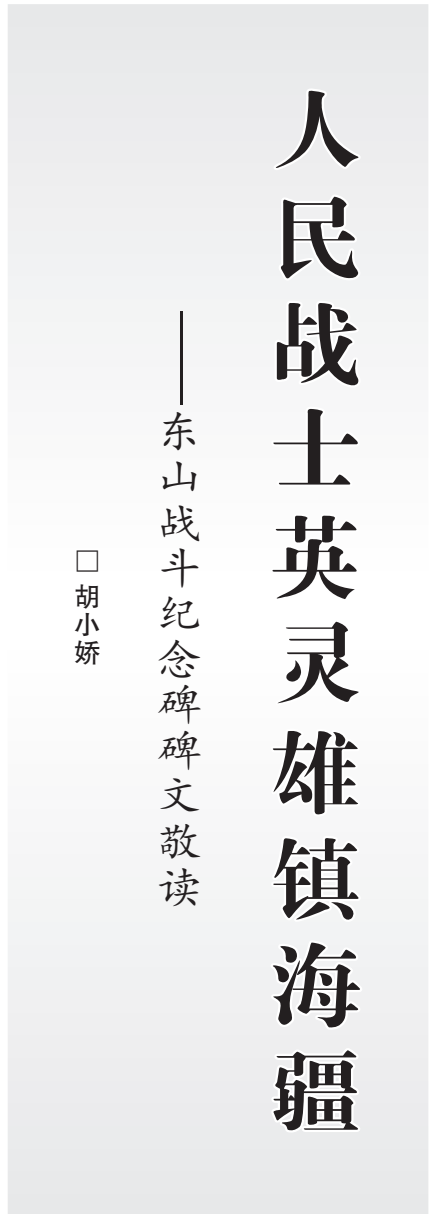
临危受命，驻守东山

国民党溃逃台湾后，一直企图“反攻大陆”，对大陆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和福建沿岸，发起过多次窜扰。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美国政府因在战场失利，妄图通过在中国大陆沿海造成军事压力，增加谈判筹码。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党军企图训练整合海陆空兵力，偷袭福建岛屿，并攻占两三个县，吹响“反攻”号角。

东山岛是福建第二大岛，处于闽粤交界地区，东临台湾海峡，南接广东潮州、汕头，历来是海防军事要地。1953年5月初，由于在福建近海屡屡发现敌舰和敌机侦察，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指示驻守东山的公安第80团团长游梅耀，将团部移驻东山岛，直接指挥部队。此时我方尚不清楚敌人真实的进攻目标，所以驻守东山岛的解放军兵力并不多，共千余人。当叶飞问如果敌军登陆东山岛能坚持多久时，游梅耀回答说：敌人来一个营，我能全歼，敌人来一个团，我坚持三天，敌人来一个师，我能坚持两天，敌人来一个军，我力争坚持一整天。

固守重点，待援歼敌

1953年7月15日下午，福建军区观察到金門料罗湾码头集结了万余名步兵，正陆续登船。对于敌军的异动，福州军区第31军军长周志坚等分析敌军可能将在东山岛登陆，在报告军区首长后，即命令第80团收缩兵力做好应对，并指挥驻守漳浦的第31军第272团向南面的旧镇集结，做好随时增援的准备。7月16日拂晓，国民党军将领胡璉



——
东山战斗纪念碑碑文敬读

□ 胡小娇

率海陆空军1.3万余人，向东山岛发起袭击。敌陆军部队在海军和空军的掩护下，分两路迅速登陆，并攻占了东山县城，扑向全岛的几个制高点；敌伞兵部队在八尺门附近空降，企图控制渡口，切断海岛与大陆的联系。面对敌军十倍于我的兵力以及铺天盖地的攻势，第80团坚决执行“固守重点，待援歼敌”的策略，驻守公云山、牛轭山和王爹山等核心阵地，并保护码头、船只等待援军登岛。为守卫八尺门码头，守岛部队在这里布防了一个水兵连百余人的兵力。敌军为了夺取渡口，首次使用了装备精良的伞兵作战。水兵连面对从天而降的敌军，没有自乱阵脚，而是用轻机枪对天空进行扫射，打乱了国民党伞兵原定的着陆计划。剩余的200余名国民党伞兵集结起来后，对我军发起了进攻。水兵连与敌军交战几个小时，一直持续到我方援军第272团先头部队到达。最后在援军的支援下，胜利围歼这支伞兵部队，保卫了码头。

东山战斗一打响，我军增援部队按预定计划，冒着敌军空中火力，昼夜疾驰，向东山岛开进。当天上午第272团大部顺利登岛，迅速投入到阵地防御战中。第41军第356团从汕头地区出发，于17日零时进入东山战地。与此同时，第28军第244团也抢渡登岛。守岛部队与增援部队顺利会师后，战斗即从防御转向全面反攻。下午，除一部分敌军主力乘军舰逃走，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军余下的掩护部队，取得东山战斗的胜利。

团结协作，捍卫海疆

守岛部队能胜利完成固守任务，离不开东山县委和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在战斗打响前，县长谷文昌领导全县人民与驻岛部队一起修筑工事。在战斗中，他带领群众给前线战士运送物资、救治伤员，组织干部群众与部队战斗在一起，补充了守岛部队的兵力。东山人民也自发支前，涌现出了“东山英雄八少年”为代表的传奇故事。

这场战斗我军共歼敌2664人，俘匪715人，还缴获大批装备物资，但也付出了伤亡1250人的沉重代价。守岛部队在援军未到之前，在弹药缺乏的情况下，依靠堑壕和土坑道，顽强抵抗数倍于己之敌的进攻。许多战士子弹和手榴弹用光后，就用刺刀与敌人肉搏，进行惨烈的拉锯战，为援军到达争取时间。在争夺高地的攻坚战中，战士们不畏敌人居高临下的火力封锁，从敌人手中夺回一个又一个据点，涌现出“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张学栋，用胸口堵住敌人的机枪射击孔，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开辟出前进道路。

东山岛一战保卫了祖国，巩固了海防，彻底击碎了蒋介石集团妄图以东山岛一战拉开“反攻大陆”序幕的美梦。7月23日，毛泽东给予东山岛作战部队“特电嘉奖”，并作出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推进农民文化教育

□ 刘丽伟

新中国成立伊始，农村百废待兴。农村文盲率高达95%以上，小农意识、不良习气等广泛存在，文化滞后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为建设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指出，要大力发展农民文化现代化，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推进农民文化教育不仅要求实现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化，还要对农民的思想观念、文化性格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进而提升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地位。

（一）

推进农民文化教育，首先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设施、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教育积极贯彻国家办学与集体办学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据统计，1949年我国小学数量为34.68万所，到1952年增加到52.7万所，增长了51.9%，其中2/3以上新建学校都在村庄。农村小学在校生由新中国成立初期不足2000万发展到1965年的9399.9万，农村基础教育匮乏状况明显好转。为降低文盲率，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实行开门办学，广设乡村中学和职业中学，大力开展农村扫盲。各地农村在完善正规化学校教育体制的同时，积极建立不同于城市学制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等农民教育形式。1966年开始，乡村积极开办夜校，近90%的成年人进入夜校学习。学习内容也是注

重服务农民生产生活之需要，使从事农村工作的党员干部及农民群众较多地懂得农业，包括土壤学、植物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以服务于科学种田。20世纪50至60年代，全国范围开展的四次大规模农村社会主义文化教育运动，使得农村文盲率大幅降低，一些地区还形成了群众性学习高潮。农民中青壮年文盲率大大降低，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1964年的48.4%。基于1966年毛泽东作出的“五七指示”，农村基层当时创办了很多“五七”大学，这种全能学校进一步拓展了农民文化教育及技能培训的平台，农村文化及职业教育水平大大提高。

（二）

推进农民文化教育，还要培养农民拥有良好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道德修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的同时，通过开展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让农民大众成为新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许多民间手工艺都是“我们民族好的东西”“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中国新诗歌的发展出路“第一条是民歌”。在此指引下，各地文艺工作者不断发扬光大春联、年画、戏曲等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加快推广广播、电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现代文化。1953

年，全国乡村有2455个文化馆、4122个文化站、2267个艺术表演团体和3833个电影放映单位，丰富多彩的板报、报告演讲、故事会、农民文化节以及声情并茂的广播、电影等让广大农民逐渐拥有了现代的公共文化生活。1958年，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歌运动”，农民们积极参与其中并表达出自己的心声，出现“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的生动局面。这些民歌是农民群众自我创作的艺术品，同时也成为农民在田间地头生产的鼓舞诗歌。虽然这些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比较粗糙，但农民群众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自我教育，改掉了不良习气，增强了自信心、自豪感，农民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三）

推进农民文化教育，最终要靠提振农民“精气神”，积极构建社会主义的主流乡村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们停留在传统的“发家致富”的微观认知上，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等宏观图景不够理解，也缺乏积极性。为此，20世纪50至60年代掀起了“比学赶帮”的热潮，若干先进乡村典型闻名全国。河南林县修建红旗渠抗干旱，山西昔阳县大寨村把穷山区打造成“层层梯田米粮川”，山东莒南县厉家寨的“愚公移山”精神更是彰显了社会主义农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